
在两种文化中滚动的芮陶庵

金开泰

按：前两天在一则微信中看到了中国驻美大使在尼克松中心作纪念尼克松访华四十年的演讲，应邀嘉宾中有美国第二任驻中国大使芮效俭，还排在显要的第二位，使我一下想起了两年前来搜集《灵秀华西坝》之时，也为他的父亲芮陶庵汇集了一个小记。介绍他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任教并从事基督教事工四十多年，在华西坝也住了8年，是一位值得记载的人物。芮效俭及哥哥芮效卫在华西坝长大，与坝上老师的子女建立了很好的交情，酷爱中国文化，对后来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便借机将这个日记奉献给喜欢的读者。



芮陶庵 (Andrew Tod Roy) (1903-2004) 芮陶庵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童年时在匹兹堡 (Pittsburgh) 度过，后来他分别在华盛顿和李尔大学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修读化学课程，准备将来可以借着行医来传扬福音。1927年，芮陶庵邂逅玛格丽特·歌露芝费特 (Margaret Crutchfield)，并于翌年结婚；其后两人在爱丁堡的 New College 以及牛津的 Mansfield College 继续学业；1930年毕业后，两人应美国长老会邀请，前往中国开展大学生的福音事工，这事工后来一直维持了四十多年。夫妇先在北京生活了两年，随后被分配到当时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担任哲学系教授。不仅深谙欧美文学，自己也创作和发表诗歌。1938年当他们回到南京时，金陵大学、金女院正为避战乱迁往成都，落户到华西大学的校园里芮氏一家根据上海中华长老会的建议，接受了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邀请，加入位于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 (WCUU) 校园的金陵大学，前往该校教书和担任宗教活动主任。乘船经海防、河内，然后沿着滇缅路到达昆明，一路辗转到了成都。

在参与当地工作之前，1939年春芮陶庵加入一个中国人的传教士小组，前往西北地区，为受伤的中国士兵提供毯子和慰问。他们经过西北的许多地方，到过阎锡山的总部，了解到中国抗战的许多实情。他说：工业合作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战时最有希望的活动之一；为有技术的难民提供就业机会，在靠近前线的地方生产必要的商品，帮助农民利用当地的材料，避免工业集中的弊端，培训工业工人，了解合作生产和生活的好处，并为重建时期提供经济活动中心。在阎锡

山的总部，他说阎元帅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向我们讲述他在第二战区的军事希望和成功。日本可以用强大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在许多地方突破。不过，她像一条在大网里的鱼——网几乎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鱼鳍易被勒住捕获，要撤退并不容易。在整个地区，教育机构的数目几乎同战前一样，但类型已经改变了。各机构都在进行军事、政治和公民三种类型的紧急教育。在山西前线，他看到中国人在铁路两边进行快速运动战，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一直遭到切断。他相信日本没有摧毁中国的军队，中国军队比战争开始时训练得更好，更团结了，武装的人更多了。政府完好无损。中国人民的意志更加坚定。日本只占领了一定的交通路线，中间的土地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日本是会被拖垮的。

然后他去了延安，成为美国长老会中唯一去过延安的人。在延安他们参观了医院、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艺学院，与延安的军民有许多接触，在回忆中他记载了见闻与感受。他说：我是圣经中的和平主义者，我相信战争不切实际，也不符合基督教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决定自卫和战斗，我相信她会为此牺牲一切，而不是试图在赢得战争的同时，维持和平时期的舒适生活。在西北部有很多事情应该让一个基督徒下跪。相信同样的共同牺牲，简单的生活，对共同利益的奉献，而不是个人利益——在我们机构中往往无法产生这些东西。他说：我带着复杂的情绪离开了延安，因为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许多领导人和学生都是开放和友好的，似乎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但对于未来也有某种担心。

在金陵大学芮陶庵任教及负责宗教的事工活动。农学家单寿父的女儿单明婉说芮还担任金大学生公社 Student Centre 负责人，带领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劳动。芮家曾在成都小天竺街广益宿舍居住。芮家常邀请学生及教工子弟去家中参加圣诞晚会和智力游戏，芮师母也曾在圣诞节演出时扮演圣母玛利亚。口腔医院前院长王翰章也说：入学后生活困难，决定边打工边求学。于是向“流亡学生救济会”申请工作。美国人、芮陶庵先生（Mr. Roy）是那里的负责人，他家住华西坝广益学舍内，每天都能见到他。我到芮陶庵的住处找他，向他说明了原由。西方人的习惯，事先没有约定，直接到别人家去谈工作是不礼貌的。可以说这是我饥不择食的行为。他热情的接待了我，并立即安排我到“学生公社”守办公室的工作，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晚 7—10 时，不定期地星期六加一次班。这样可以解决我的伙食问题。学生公社，英文名 Student centre，按现在说法就是学生俱乐部或者是学生活动中心。那时是

华西坝五大学学生俱乐部，有开会的屋子、做游戏、打弹子的地方和图书借阅处。他还启动一个山羊项目，因为如果牛奶和羊奶两种奶都没有经过巴氏杀菌，那么羊奶更安全，并以市场价的四分之一，把羊奶卖给了有结核病的学生。他还到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调查学生生活情况。1942年11月3日芮陶庵与中国学生救济会的江之汉赴西北参加学生宗教年会，历经汉中、城固、宝鸡、西安，在西北联大、西北师范学院等校作演讲，推动设立学生公社，举办救济学生工作，历时七个星期，所得印象极佳。尤以当地青年之爱国热忱、生活清苦，衣食住行及医药设施均不及成都各大学，但多数学生皆专心向学，且富有自助能力，某校设立学生公社，发动募捐，顷刻即募得四五千元，校长亦受感动，捐千元。西北学生生活水准大抵相似，不像成渝之贫富悬殊。他们甚关心国内外问题及四川学生的情形。他还参加暑期学生到羌族地区开展考察和服务，又到各地旅行，知晓许多中国底层的生活状况。1943年8月“光光山”，无人到过的神秘性，激起华西坝上的芮陶庵、赖朴吾，惠灵吞与学生张富培几个人的好奇的兴致，乃结队花了10多天的功夫终于登上了光光山，解密了这个神秘的边地。张富培详细记载了这次艰辛的旅行，刊登在燕京新闻。他们站在小光光山的最高峰。观看了美丽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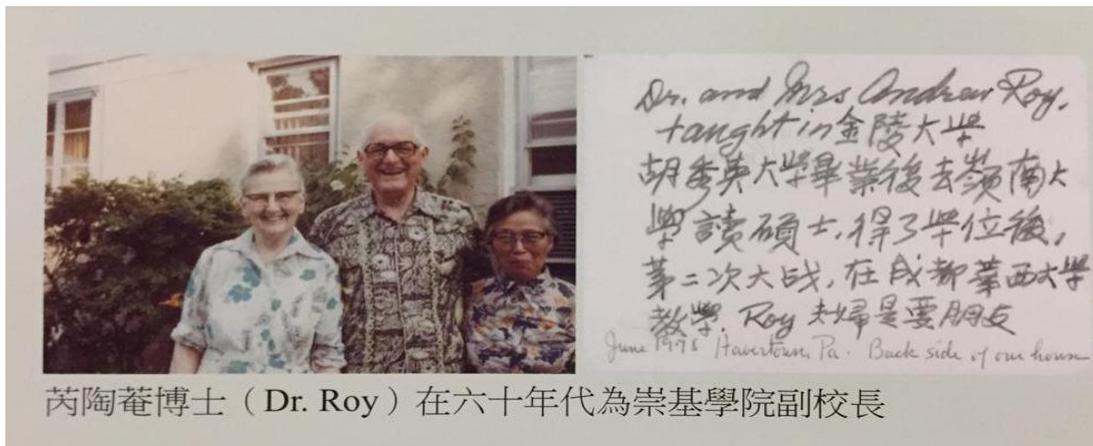


来自网络

山脚下白云渐渐散去，露出了远远的成都平原，那正是稻子快要成熟的季节，望过去，绿海无边，与天色分不出来，间或有弯曲小河流淌，汶沟、渠，密密分布，好似一大片青绿地毯，上面散着绿色的丝线，阳光照射下晶晶闪闪，使人不觉得自己立脚于光光山之巅。遥望远耸立的太子山城，山顶有用石头

做成的伟大城寨，积雪赤化，太阳反射，发出晶亮之光。阳光照射在光秃的岩石上，远远望去，称红岩带，金光四射，因而弄成些稀奇的传说。

芮陶庵同时也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失去了财产和书籍；父母病逝也不能回去；感染了疟疾、伤寒、胸膜炎和各种蠕虫等种种苦难。他说：“这意味着我们感到传教士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不，绝对不是。我们都有风险。但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做我们觉得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爱上了中国及其人民。一次，他和来自英国的圣公会医疗传教士诺曼一起开车，途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车子又出故障，许多人爬上了车，用激动的中文催促他们开快点。诺曼变得紧张，很冲动。他打开车门，爬到卡车后部，抓起橡胶软管，开始打中国人，用英语大喊：“滚开，你们这些傻瓜，滚开，该死的，滚开！”芮陶庵却对着诺曼的耳朵大喊：“永远，永远不要打中国人！我们是外宾，我们是传教士。”由于他是做事工的，又平易近人，和许多学生都成了朋友，如金女大的胡秀英，先后在金女、岭南就读，又在华西、美国大学、香港大学任教知名生物学家，60年代在香港尚有很好的交情。



1945年，芮氏夫妇返抵纽约。回国初期，芮博士曾任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传部负责人事的执行干事，但不久他又重返校园。1948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回到金陵大学任教，仍参与学生的事工工作。

当时正值国共战争的尾声，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5月的一天解放军进城，新政建立。1950年12月6日，南京市学联组织全市15所大中学校7000多名学生在金大操场举行控诉美帝文化侵略大会。1950年，芮陶庵因为说朝鲜战争是朝鲜先攻打韩国的，受到批判，金大学生到南京金银街1号芮家门外示威游行。经过多次的反复交涉，最后于1952年2月终于被批准离境，经广州到达香港。

在结束中国内地工作之时，他以金陵大学、金女大为例，对基督教大学进行了反思。第一：大学从一开始就是面向社会的，它很快就派出了学生和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努力解决问题，缓解人民的需要。第二，大学注重实效，善于创新。第三：学校继续与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基督教全国委员会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它的员工活跃在工业合作社。第四，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就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校长、院长和大多数系主任都是中国人；汉语是其主要的教学语言；它由一个在中国政府注册的中国董事会管理，并受教育部的监管。第五，大学也保持着完善的教育课程，正确地关注中国食品种植者和其他的实际问题。特别强调：这所大学为人民服务，创新，合作，完全是中国的，不是地方的，而是全国性的，并且有一个平衡的教育计划。最重要的是，它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一所大学的职责，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培训、实用的商业培训、优秀的语言培训，并通过这一切强调道德和诚信。当然，应该坦率地承认这所大学有缺点，也有错误，特别是新旧混用，中外混用。但是，这所大学和中国其他 14 所或更多的基督教大学都有一段值得骄傲的过去。如果一个人过着美好的生活，对他的国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赞扬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人们知道事实。大学也是如此。事实是有说服力的。

他们离开南京，在纽约担任传教委员会的人事秘书。1954 年，被派到远东，研究香港的难民情况，帮助困难的学生寻求兼职来完成学业。后来参加筹建崇基学院，任代理总裁，负责资金管理，并教授哲学。继后任崇基学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后来崇基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副校长，负责公共关系，以及学院刊物的编辑，并继续在九龙国语会担任长老。根据当年芮博士的学生李沛良教授（崇基学院前院长）所言，“芮博士不单是一位情感丰富的诗人，也是一位富有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李教授补充：“我就读崇基学院社会学及社会工作学系，曾修读芮博士执教的『政治学导论』，十分钦佩他对中西政制的深入浅出论述。在我心目中，芮博士是一位很有启发性而且又关怀学生的老师。”（李沛良，〈院长序〉，记于芮陶庵博士著的《渴慕更深》，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出版，2001，页 4）崇基 1959 年毕业的温姓校友曾这样回忆这位备受同学敬爱的 Dr Roy：“崇基最初由市区搬入马料水时，一般同学都很贫苦，校方设立了一些工读计划，每小时八毛！因申请人太多，不容易安排工作给同学。Dr. Roy 想出了一个给我们工作的好计划，就是把火车站靠近崇基那边的小山坡的山泥掘去，移成平地，就是今天中大在大学站旁的停车场！我们

工读生因感激芮博士对我们的厚爱，便将那个原来的小山叫做 Dr. Roy Hill. ! ”

1960 年芮代理崇基院长时，在学院第三届音乐会上致献词，希望音乐会在提高香港音乐欣赏和演奏水平尽一分力量。主张圣乐、中西传统音乐和近代流行歌曲各有各的地位与价值。

1968 年，芮博士获华盛顿和李尔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夫妇俩在 1972 年退休，定居美国费城。

在七十、八十年代芮陶庵曾三次访华，来南京看望中国的老朋友们。其后芮太太身体渐差，两人就回到匹兹堡生活。1992 年，芮太太与世长辞。2004 年，芮博士以 101 岁高龄蒙主感召，安息礼于美国长老会宾夕法尼亚州 Sewickley 教堂举行。

芮陶庵教授的长子 David Roy（芮效卫）、次子 James Stapleton Roy（芮效俭）分别于 1933 年和 1935 年在南京出生，从小也活跃在华西坝足球场上，并与五大学教师子女建立了交情，酷爱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后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芮效卫后来成为汉学家，倾力 30 年翻译了《金瓶梅》，被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称为好的译本，林称：“芮译在考虑到翻译本身并不能将《金瓶梅》中博大精深的意义全部展现出来，所以用了 4400 个尾注来做翻译之外的阐释”。芮效卫 2016 年 5 月 30 日在芝加哥逝世，享年 83 岁。芮效俭 1991 年到 1995 年间，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是当今美国仍然活跃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出版了《芮陶庵中国生活回忆录》，记录了他在中国 42 年难忘岁月里充满的惊喜和快乐，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最后说：我们退休了，感谢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充满惊喜和美好希望的国家，人们友好、勤劳、聪明，他们照顾他们的家庭并且在他们国家长久生活。的确，这些年来没有无聊的时刻，也没有遗憾。但该书现在还没有中文译本。

参见：崇基校友会白耀灿、卢广锋供崇基网页的介绍，王翰章《翰墨荃馨》及单明婉《金陵杂忆：八年离乱在成都》及《芮陶庵中国生活回忆录》。